

美国的楔子战略与 中苏同盟的分裂^{*}

凌胜利◎

【内容提要】 中苏同盟的分裂是影响冷战进程的重大事件，以往关于中苏同盟分裂原因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中苏两党两国的内部矛盾，忽视了美国这一重要的外部因素。中苏同盟在冷战期间被美国视为重大威胁，分化削弱中苏同盟符合其利益，美国为此采用了楔子战略。本文通过过程追踪，分析了美国分化中苏同盟的楔子战略，将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中苏尚未出现意识形态分歧的情况下对中苏一视同仁地实施对抗型楔子战略；第二阶段是在中苏出现意识形态分歧的情况下对中苏进行区别对待的楔子战略。从战略效果来看，第一阶段的效果不佳，第二阶段的战略效果明显，加速了中苏同盟的分裂进程。不过，美国楔子战略的“外因”更多是通过中苏同盟的“内因”起作用，并且由于战略过程的漫长性，这一过程也充满了许多偶然性和非意图性因素。

【关键词】 中苏同盟 楔子战略 联盟预阻 联盟分化 中美苏三角关系

【作者简介】 凌胜利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讲师、博士。

电子邮箱：Shenglicfau@sina.com

* 本文是作者主持的教育部社科青年项目“联盟的转型与中国的对策研究”、北京市社科青年项目“亚洲新安全观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项目编号15KDC043）的阶段性成果。感谢漆海霞副教授、《国际政治科学》匿名评审专家的建设性意见，文中错漏与不当之处由本人负责。

《国际政治科学》2015年第3期（总第43期），第68—105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中 苏同盟的形成、发展与分裂是影响冷战进程的大事。关于中苏同盟分裂的原因，更是一度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不过以往的研究主要认为中苏同盟的分裂是中苏两党两国的内部原因所致，对其外部原因关注甚少。中苏同盟的存在被美国视为重大威胁，基于理性的视角，分裂中苏同盟符合美国的利益。那么，美国事实上是否对中苏同盟采取了楔子战略？美国在中苏同盟分裂的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发挥何种作用？这一系列问题值得研究。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中苏同盟分裂原因的既有文献梳理；第二部分主要分析美国的楔子战略对中苏同盟的影响；第三部分论述了美国如何采取楔子战略阻止中苏结盟；第四部分研究了在中苏尚未出现意识形态分歧的情况下，美国对中苏一视同仁地实施对抗型楔子战略；第五部分分析了中苏出现意识形态分歧后，美国对中苏区别对待地实施楔子战略。最后，得出美国的楔子战略对中苏同盟分裂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这一简要结论。

一 既有研究及其不足

中苏同盟为何分裂？关于这一问题国内外有过大量的研究。在中苏同盟分裂初期有关分裂的原因就引人关注。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主要从意识形态视角来分析，认为中国将苏联视为意识形态上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从而引发矛盾，这是中苏分别处于社会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所致。而西方学者则更多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个人因素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意识形态论战只是中苏关系破裂的表象，核心问题是中苏国家利益的冲突，其中政治和军事因素是中苏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① 不过，两者都缺乏很强的说服力。^② 冷战后，由于相关档案逐渐公开，有关中苏

① 孙帅：《西方视野下的中苏关系破裂原因探析——以〈中国季刊〉为研究视角》，《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5期，第109页。

② Robert H. McNeal, "The Sino-Soviet Tangle,"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19, No. 2, 1964, pp. 224-230.

同盟分裂原因的探究不断增加,主要存在国家利益冲突、意识形态分歧、领导人个人不和、苏联大国大党沙文主义等观点。^①

一是中苏两国的国家利益分歧导致同盟破裂。这种观点主要认为中苏同盟是战略同盟,存在着共同的战略利益,战略利益的分歧导致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进而引发国家关系恶化。^② 战略利益的最大分歧体现在中苏两国对国际局势的看法和对美国实力与意图的认知上。不过中苏之间的国家利益分歧不仅体现在战略利益层面,而且体现在许多具体利益方面,比如贸易关系、发展核武器等。冷战期间,美国政界也持类似观点,认为中苏同盟的分裂具有必然性,中苏之间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利益分歧,中苏同盟难以持久。^③

二是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导致中苏同盟破裂。^④虽然中苏两国都宣传以马克思主义来认识世界、指导实践,但分别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国际地位,两党因此出现分歧,进而导致两国关系恶化。意识形态分歧属于原则问题,形成零和竞争态势,缺乏解决方案。^⑤

三是领导人个人不和导致中苏同盟破裂。^⑥ 这种观点认为,是毛泽东

① 关于中苏同盟分裂原因的综述,参见栾景河《“中苏关系破裂原因”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6期;李新艳《中苏同盟破裂原因近十年研究综述》,《党史文苑》2008年第4期;徐思彦《走向破裂的结盟:中苏同盟研究的新进展》,《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Donald S. Zagoria, “Mao’s Role in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Pacific Affairs*, Vol. 47, No. 2, 1974, pp. 139 – 153.

② 曲星:《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的战略、理论与利益背景》,《外交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第15页。

③ 美国的许多政策明确表达了这一观点,美国一些学者也认为中苏国家利益分歧是中苏同盟分裂的真正原因,参见Harrison Salisbury, *War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New York: Norton, 1969); Tsien-hua Tsui, *The Sino-Soviet Border Disputes in the 1970s* (Ontario: Mosaic Press, 1983)。

④ Geoffrey Francis Hudson, *The Sino-Soviet Dispute* (New York: Praeger, 1961); John Gittings, *Survey of the Sino-Soviet Dispute: A Commentary and Extracts from the Recent Polemics 1963 – 1967* (London: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68); Rudolf Schlesinger, “Observations on the Sino-Soviet Dispute,” *Science & Society*, Vol. 27, No. 3, 1963, pp. 257 – 282; 李鹏:《意识形态的主观建构和中苏关系的破裂》,《同济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孙其明:《意识形态分歧与中苏关系的恶化》,《同济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⑤ Donald S. Zagoria, “The Future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Asian Survey*, Vol. 1, No. 2, 1961, pp. 3 – 14; 沈志华:《中苏同盟破裂的深层原因》,《中华读书报》2011年1月26日,第9版。

⑥ 朱瑞真:《中苏分裂的根源》,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编《战后中苏关系走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第101页。

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之间的不和造成了中苏分裂。其一是领导人的个性不和会影响两国在具体问题上的合作。^① 这种观点主要从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的关系上分析毛泽东、赫鲁晓夫的个性对中苏同盟的影响。^② 其二是国际共运的领导权之争恶化两国关系。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严重影响了两党两国关系。中苏分裂的原因被广泛认为是中国向苏联的老大地位发起挑战。^③

四是国际共运组织的领导结构弊端导致中苏交恶。国际共运的领导结构存在弊端，无法解决好领导权分配与继承的问题。^④ 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主要在于两国在国际共运中的分歧或领导权之争。^⑤ 国际共运中影响中苏关系的三大因素是组织、决策与领导权。中国要想与美国竞争，必须依靠共产主义集团的力量；而苏联则可以单独与美国进行竞争，中苏对共产主义集团的需求程度不同决定了两者的分歧。中苏矛盾的根源在于共产主义集团的领导结构弊端。^⑥ 沈志华认为：“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某种固有的结构性弊病”。^⑦ 这主要体现为两点：“其一，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结构发生变化以后，争夺话语权成为中苏两党解决它们之间路线和政策分歧的基本手段，而目标是国际共运的主

① 美国学者认为毛泽东的性格与两次台湾危机和中苏关系破裂有着很大的关系。参见 Michael M. Sheng, “Mao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Superpowers in the 1950s: A New Look at the Taiwan Strait Crises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 *Modern China*, Vol. 34, No. 4, 2008, pp. 477–507.

② Sergey. Radchenko, *Two Suns in the Heavens: The Sino-Soviet Struggle for Supremacy, 1962–1967* (Washington, D. 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567.

③ Lowell. Dittmer, *Sino-Soviet Normalization and its 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s, 1945–1990*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2); John Bradbury, “Sino-Soviet Competition in North Kore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6, 1961, p. 15; 沈志华：《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与结果》，《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2期；沈志华、李丹慧：《结构失衡：中苏同盟破裂的深层原因》，《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10期。

④ W. Averell Harriman Reviewed, “Sino-Soviet Conflict,” *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8, No. 1, 1965, pp. 101–111.

⑤ Lowell. Dittmer, *Sino-Soviet Normalization and its 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s, 1945–1990*, p. 3.

⑥ Robert A. Scalapino,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in Perspectiv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351, 1964, pp. 1–14.

⑦ 沈志华：《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结果》，第29页。

导权。其二,党际关系掩盖甚至替代了国家关系,在这种结构中,从本质上讲没有主权意识,没有平等观念。”^①

五是苏联的大国大党沙文主义引发中苏矛盾。中苏两国两党处在不平等的地位,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对中国颐指气使导致两国关系恶化。^②苏联的大国大党主义与中国追求平等的冲突是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③在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中,无论是民族感情还是领导人的个人情感都会影响两国关系。^④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中苏关系的恶化是对其本身平等关系的矫枉过正所致。^⑤此外,种族、历史、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也被认为是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⑥

上述观点见仁见智,并无任何一种观点获得了学界的共识。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可能是错综复杂的,甚至存在许多偶然性因素,因而难以确切地找到一种颇具说服力的因果关系。中苏同盟破裂可能是多重系统效应,其中属于间接、非意图性、延迟或未发生的维度的效应,在数量上更为可观。^⑦正如有学者认为,决定中苏同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一是两国精英在国内的相对力量;二是两国在共产主义集团的相对影响;三是中国对苏联的依赖程度;四是共产主义集团与西方世界的权力关系。^⑧目

① 沈志华、李丹慧:《结构失衡:中苏同盟破裂的深层原因》,第3页。

② “真正的实质问题就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295页;刘克明:《中苏关系40年的历史教训》,《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1期。

③ 孙泽学、唐年新:《中苏同盟破裂根源探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第98页。

④ 关于民族情感对中苏关系破裂的影响,参见杨奎松《中苏国家利益与民族情感的最初碰撞——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为背景》,《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关于毛泽东的世界观、个人情感对中苏关系破裂的影响,参见牛军《毛泽东与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1957—1959)》,《国际政治研究》2001年第2期。

⑤ 左凤荣:《中苏同盟破裂原因析》,《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国际会议论文集》2003年8月,第544页。

⑥ Michael Freeberne, “Racial Issues and the Sino-Soviet Dispute,” *Asian Survey*, Vol. 5, No. 8, 1965, pp. 408–416.

⑦ 唐世平、王凯、杨珊:《理解国际安全战略中的“系统效应”——以中苏同盟破裂的多重影响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8期,第4页。

⑧ Allen S. Whiting, “Dynamics of the Moscow-Peking Axi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321, No. 1, 1959, p. 103.

前,对中苏关系、中苏同盟破裂的研究主要是历史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还有待借鉴其他学科。也有学者尝试进行理论与方法革新,希望能够找到中苏关系破裂原因的更具说服力的答案。高飞认为应该采用结构现实主义来分析中苏关系,^①王栋则从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结构现实主义、认知心理学、国内政治和认同等不同的理论框架分析中苏关系。^②

中苏同盟分裂属于联盟瓦解研究范畴,能否基于联盟瓦解理论对其分裂原因进行研究是学术研究的新尝试。有关联盟瓦解的研究在联盟研究中比较少见。联盟瓦解包括被国家的机会主义行为废除、联盟到期、成员国丧失独立性和新条约签订等现象,^③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的联盟义务未能履行或仅是部分履行。有关联盟瓦解的原因,学界主要认为是联盟内部的管理或联盟内部互动的失败。^④对此的解释主要从联盟价值、联盟属性、成员国属性和联盟可靠性、联盟制度化等要素进行分析。^⑤周建仁则将联盟瓦解的原因总结为五种解释路径:“目标实现说”认为同盟目标实现后同盟就会解体;“同盟类型说”认为进攻性同盟、对称同盟和非制度化同盟更容易解体;“国家制度说”则认为民主国家之间的同盟更容易维持;而“国内政治说”认为国内体制变化、人口代际更替以及意识形态分歧会导致同盟解体;“军备同盟效用比较说”认为同盟是否会解体,与军备同盟之间的效用比较有关。^⑥这些原因分析对于理解联盟瓦解具有重要帮助,

① 高飞:《1950—60年代中苏关系演变研究的现状、问题与探索》,《国际论坛》2003年第6期,第40—45页。

② 王栋:《中苏关系研究的理论与历史》,《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4期,第63页。

③ Brett Ashley Leeds and Burcu Savun, “Terminating Alliances: Why Do States Abrogate Agreement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9, No. 4, 2007, pp. 1118—1132.

④ 苏若林、唐世平:《相互制约:联盟管理的核心机制》,《当代亚太》2012年第3期,第7页;刘丰、董柞壮:《联盟为何走向瓦解》,《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0期,第10页。

⑤ 刘丰、董柞壮:《联盟为何走向瓦解》,第9页;董柞壮:《联盟类型、机制设置与联盟可靠性》,《当代亚太》2014年第1期,第100页。

⑥ 周建仁:《同盟解体的研究:回顾与评析》,《国际论坛》2012年第4期;周建仁:《战略分歧、自助能力与同盟解体》,《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期。

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各种原因解释路径的因果机制有待进一步细化,很多原因分析只是一种可能性概率,对于其中的内在机制分析还需加强;二是都较少分析外部原因,特别是敌对国家的楔子战略使用对于联盟分裂或瓦解的影响。刘丰等的研究认为,需要加入背景条件来分析联盟瓦解,与以往较多从联盟内部原因分析相比,他更多看到了联盟外部因素的重要作用,不过其主要从战争与冲突的国际环境进行分析,而非对敌对国家的楔子战略进行分析。^① 大国将对国际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也是影响背景条件的重要因素,因此,基于敌对国家的楔子战略分析,能够对人们理解联盟瓦解进行有益补充。对于中苏同盟的瓦解而言,同盟瓦解理论的各种解释虽然都有一定道理,但事实上又存在相互削弱的情况,而且在联盟性质、目标等很多因素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中苏同盟就逐渐瓦解了,这也就意味着外部因素肯定起到了一定刺激作用,需要对此进行关注。

总之,上述关于中苏同盟破裂原因的看法,主要是从中苏两党两国的角度进行分析,没有或者较少考虑当时它们的共同敌人美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上述原因中,无论是国家利益分歧、意识形态矛盾、国际共运领导权竞争还是领导人个人关系不和,都无法摆脱美国因素的影响。苏联、中国在冷战期间均被美国视为重大威胁,中苏同盟无疑被美国列为最为强劲的对手之一。^② 从理性角度分析,分化、削弱中苏同盟无疑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而在现实中,美国也确实采用楔子战略来分化中苏同盟,成为促成其分裂不容忽视的原因。因而研究美国分裂中苏同盟的楔子战略,对学界从外部视角理解中苏同盟分裂的原因具有帮助。

二 美国的楔子战略与中苏同盟

中苏同盟形成于 1950 年,于 1980 年终结。在此期间,中苏同盟关系

① 刘丰、董柞壮:《联盟为何走向瓦解》,第 11 页。

② Partha S. Ghosh, *Sino-Soviet Relations: US Perception and Policy Responses 1949 - 1959* (New Delhi: Uppal Publishing House, 1981), p. 1.

经历了几个阶段。有学者将 1950—1955 年界定为友好合作时期，1956—1959 年为分歧的初期，1960—1962 年为公开争论的阶段，1962—1963 年为冲突的加剧时期，1963—1964 年为双方尝试关系缓和的失败时期。^①此后中苏同盟关系几乎名存实亡，甚至还处于敌对状态。不过本文主要就美国针对中苏同盟的楔子战略展开研究，因而研究的时间段主要集中在 1949—1964 年。

关于“楔子战略”的概念，蒂莫西·克劳福德（Timothy W. Crawford）最初将其界定为“通过分化敌对联盟或阻止潜在的敌对联盟（alliance）的形成，被认为是一种楔子战略的运用”。^②后来通过进一步研究，将楔子战略的概念界定为“一个国家以可接受的成本去阻止、破坏或弱化一个威胁性或围堵性联盟（alliance）”。^③由此可见，楔子战略的核心在于削弱敌对联盟的力量。不过，这一概念并未将楔子战略的主体、客体、目标、手段等战略要素问题交代清楚。楔子战略可以理解为联盟（超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或次国家行为体，基于阻止潜在的敌对联盟形成或分化、破坏、瓦解已经形成的敌对联盟的目标，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等资源，采取对抗或调适等战略手段来实现这些战略目标的艺术与科学。^④楔子战略主要以一种“反联盟战略”的姿态出现，因而主要围绕着联盟的形成、管理和瓦解展开。这些联盟虽然松散紧密程度不一，但基本上都是基于安全合作而形成的联盟关系。楔子战略的目标主要包括联盟重组（realignment）、联盟解除（dealignment）、联盟预阻（prealignment）和联盟分化（disalignment）四种。^⑤其中联盟重组是化敌为友；联盟解除

① Peter Jones and Sian Kevill,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9 - 1984* (Longman House Press, 1985).

② Timothy W. Crawford, "Wedge Strategy, Balancing, and the Deviant Case of Spain, 1940 - 41," *Security Studies*, Vol. 17, No. 1, 2008, p. 1.

③ Timothy W. Crawford, "Preventing Enemy Coalitions: How Wedge Strategies Shape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 4, 2011, p. 156.

④ 凌胜利：《分而制胜：冷战时期美国的楔子战略》，博士学位论文，外交学院，2014，第 24 页。

⑤ Timothy W. Crawford, "Preventing Enemy Coalitions: How Wedge Strategies Shape Power Politics," pp. 165 - 166.

是使敌对联盟不复存在；联盟预阻是在敌对联盟形成前就采取措施阻止潜在对手结盟；联盟分化是降低敌对联盟的威胁，使其存在效应大打折扣。除联盟分化所涉及的范围相对宽泛外，其他楔子战略的目标都比较明确。楔子战略的类型主要有“选择性接触”和“对抗”两大类。其中选择性接触主要是指通过各种手段来接近、收买对象国，而对抗则是通过政治、军事等对抗手段向对象国施加压力，进而导致其对联盟产生离心倾向。

中苏同盟是冷战时期美国楔子战略实施的重要对象，对此的研究也相对丰富。^① 以往关于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分析，主要是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视角出发，较少注意到美国在促使中苏同盟破裂中所发挥的作用。根据目前已经解密的美方档案，可以发现美国事实上一直密切地关注着中苏同盟的发展，并尝试采用各种手段来阻止其形成，利用各种措施分化中苏同盟等。早在中苏同盟形成前，美国就希望与中国国民党划清界限，采取一种“观望”的态度以获取中共的好感，同时保留一些贸易关系和外事机构，希望能与中共保持一定的联系。^② 在中苏同盟订约谈判期间，美国也不断通过宣传战、心理战等方式，增加中苏同盟的缔约难度，毛泽东也意识到美国这位敌人的价值，迫使苏联做出更多让步。^③ 尽管阻止中苏结盟未能成功，但美国并未就此放弃。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美国认

① David Allan Mayers, *Cracking the Monolith: U. S. Policy Against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9 - 1955*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 Gregory Mitrovitch, *Undermining the Kremlin: America's Strategy to Subvert the Soviet Bloc, 1947 - 1956*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Gordon H.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 - 1972*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 - 1992* (New York: McGraw-Hill, 1993); 高沃龙:《对手与盟友》，刘戟锋、袁南生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沈志华:《冷战的起源：战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及其转变》，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翟强:《论美国对中苏的楔子战略》，《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胡晓丽:《中苏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1945—1989》，博士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08；李莉《1949—1959 年的中苏关系中的美国因素》，硕士论文，山西大学，2004。

② 资中筠:《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230—256页。

③ Thomas J.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 - 1958*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为短期内分裂中苏同盟几乎不可能，但这并不代表长期内毫无希望。为此，杜勒斯建议美国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以压促变，增加中国对苏联的依赖，以激化中苏同盟的矛盾，从而使其分化瓦解。总体而言，国内外学界在美国针对中苏同盟的联盟预阻、^① 联盟分化方面都有过大量的研究，从各个方面揭示了美国楔子战略对中苏同盟的影响。

从战略目标来看，冷战初期，中国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仅次于西欧和拉美，中国所处的远东地区对美国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利益。在战略资源方面，美国当时难以同时应对欧亚两端，并且其欧洲盟友也十分担忧美国深陷远东而冷落或忽视欧洲。这也决定了美国在远东的战略资源有限，难以对华采取奖赏性楔子策略。在战略阻力方面，美国面临十分巨大的困难。意识形态的敌对加上美国援蒋反共的仇恨，使得中美处在极端敌对的状态，美国想要争取中国，其难度可想而知。基于战略目标、资源和阻力的考虑，美国主要采用对抗性楔子战略来分化中苏同盟，突出特点是持续对华施压，具体路径是从经济和军事两个方面同时施压。

根据目前已经解密的档案和冷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现实，可以确定当时美国的确实实施了分化中苏同盟的楔子战略，但其作用如何却是众说纷纭，该战略在中苏同盟破裂过程中是否起了作用，以及作用如何，都是有待研究的问题。由于现有档案有限，难以做出极为精确的分析，但其内在逻辑相对明晰。

首先，冷战期间中美苏三国间存在战略互动，美国因素对中苏同盟的影响显而易见。中美苏三国是冷战期间的重要力量，它们之间的力量组合模式对冷战的影响尤为关键。在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中，中国的价值十分重要，中美苏的互动贯穿中苏同盟始终。无论是中苏同盟缔约谈判，还是中苏同盟的强化、分化和破裂，美国的影响无处不在。俄罗斯学者奥·维斯塔认为：“对于中苏联盟来说，与美国之间的冲突既是产生内聚力的要

^① 关于美国阻止中苏同盟的研究可，参见资中筠《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时殷弘：《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与中美关系（1945—1950）》，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第7、167页。

素, 又是出现争论的焦点。朝鲜的反美战争促成并加强了中苏同盟, 这是苏联和中国在 1950 年时都没有预料到的。另一方面, 从 1958 年起, 与华盛顿进行全球性对抗的战略分歧, 导致了中苏联盟的分裂。”^① 既然中美苏之间存在战略互动关系, 那么对中苏同盟的分析就不能不考虑美国因素。在既有关于中苏同盟破裂原因的研究当中, 无论是国家利益冲突, 还是意识形态分歧等, 大多涉及美国因素。对美国全球战略等问题的认知差异, 加剧了中苏两党、两国在许多具体问题上的分歧, 由此可见, 美国因素对中苏同盟破裂的影响确实存在。

其次, 美国的楔子战略加速了中苏同盟的分裂。联盟预阻失败后, 美国实施了全方位施压的对华战略, 希望借此促成中苏同盟的分裂。在美国对抗性的楔子战略中, 最为突出的是经济、军事类楔子策略。经济上, 美国通过巴黎统筹委员会等途径联合盟国对华实施极为苛刻的贸易管制, 加剧了中国工业品进口的难度, 不得不更多依赖苏联, 但中苏之间在贸易领域存在许多摩擦和矛盾, 加之民族情感发酵的影响, 其对中苏同盟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军事上, 美国实施对华围堵, 还在朝鲜战争、台海危机等历次冲突中对华进行核威慑。这些都给中国造成了极大的安全压力, 推动了中苏加强军事合作, 也导致矛盾有可能滋生。特别是在中国发展核武器问题上, 中苏存在巨大分歧, 也被认为是中苏同盟破裂的重要原因 (戴超武、牛军、沈志华均持类似观点)。此外, 美国的对华心理战、在西藏策划颠覆活动、秘密进行或协助国民党在大陆进行暗杀等颠覆活动, 都可视为美国对华实施对抗性楔子战略的重要表现。

最后, 尽管学界对于美国楔子战略在分裂中苏同盟上的作用存在认识分歧, 但不能否认其作用的存在。对于该问题学者们主要存在“肯定论”、“不确定论”和“否定论”三种观点。“肯定论”的代表人物有张

^① 奥·维斯塔:《中苏同盟与美国:战争、政策与理解(1950—1961)》,载李丹慧主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175页。

少书、张曙光等。张少书认为，美国的楔子战略对中苏同盟破裂起到了作用。他通过对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分析，论证了美国的楔子战略对中苏同盟的重要影响。^① 张曙光认为，美国对华的经济类楔子战略加剧了中苏之间的经济矛盾，导致两国关系恶化。^② 胡晓丽认为：“中苏关系的逐步恶化固然与两国的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内在’冲突有重要关联，但同时美国因素的‘外在’作用亦不容低估。正是美国的‘楔子战略’所起的破坏作用，中苏两国最终由结盟友好走向了分裂对抗，导致了中苏同盟的实际破裂。”^③ “不确定论”代表人物有刘军、加迪斯。刘军虽然认可美国因素在中苏同盟形成与破裂过程中的影响，但并不认为美国的楔子战略是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刘军认为：“从影响中苏同盟形成与破裂的诸多外部因素来看，美国扮演着共同威胁者、楔子驱动者以及平衡实施者的角色。美国的‘楔子战略’对中苏同盟的瓦解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但从根本上看，是中苏之间关于对美观念与政策的分歧才导致矛盾的产生。”^④ “不确定论”既不肯定也不否认美国楔子战略对中苏同盟分裂的影响。加迪斯认为，虽然美国的楔子战略加剧了中苏矛盾，并且在两次台海危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不过出于学术严谨性考虑，他认为依据目前的可用文献，还难以论断美国的楔子战略导致了中苏同盟破裂。^⑤ “否定论”认为美国的楔子战略并未对中苏同盟的分裂产生作用。俄罗斯学者奥·维斯塔认为，美国的对抗性楔子战略并未对中苏同盟破裂起到作用，其理由是中苏同盟关系的恶化并非是在美国压力增强的时候，反而是在美国压力减弱

① Thomas J.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② Shuguang Zhang, *Economic Cold War: America's Economic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9 - 1963* (Washington, D. C. and Stanford, Calif.: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③ 胡晓丽：《美国的“楔子战略”与中苏分裂》，《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82页。

④ 刘军：《中苏同盟形成与破裂过程中的美国因素》，《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第9页。

⑤ 刘易斯·约翰·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潘亚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229页。

的时候。^① 不过,这种观点将美国的施压和中苏同盟的分裂视为简单的线性关系,忽视了美国实施分化中苏同盟的楔子战略时“区别对待”比“一视同仁”更为有效。压力增强会促进中苏同盟的相互需要,促使它们增强团结;而压力减弱反而使得彼此需求下降,联盟内部利益分歧加剧,彼此包容度下降。尽管对美国楔子战略在中苏同盟分裂中的作用见仁见智,但基本都认可美国楔子战略不容忽视的影响或作用。至于美国如何通过楔子战略分化中苏同盟,主要存在经济施压和原子威慑两条路径。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美国的楔子战略事实上在中苏同盟分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苏同盟的诸多重要问题上美国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不过,美国的楔子战略具体如何实施,主要体现在联盟预阻和联盟分化两个阶段。

三 联盟预阻:美国阻止中苏结盟(1949—1950 年)

二战后,中苏两国并非天然盟友,两国之间因历史问题等存在间隙,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也并不十分亲密。中苏同盟的形成甚至被视为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中苏结盟是一个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② 毛泽东和斯大林最初都没想把对方作为盟友。毛泽东曾认为,战后中国所能指望得到的大国援助不是来自苏联,而是来自美国。因此,他最初为中共选择国际联合对象时,曾对美国寄予希望。^③ 而苏联为了维护其远东利益,^④ 选择了国民党

① 奥·维斯塔:《中苏同盟与美国:战争、政策与理解(1950—1961)》,第191—192页。

② 沈志华:《无奈的选择:中苏同盟建立的曲折历程(1944—1950)》,《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第35页。

③ 沈志华:《中苏同盟建立的曲折历程》,《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第1页。

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斯大林确定了战后苏联在远东的两个战略目标:把外蒙古从中国版图中独立出来,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以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引自沈志华、谢·冈察洛夫《〈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39页。

作为盟友，并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① 二战后，美国在中国主要支持国民党，但从更宏观的战略角度来看，无论美国支持中国国内的哪一派，都是基于将中国纳入美国势力范围的考虑。因此，随着国民党在国内战争中逐渐失势，美国也渐渐抛弃国民党。与此同时，斯大林也开始意识到中共的重要性。“为了加强与美国对抗的实力，斯大林需要新中国加盟社会主义阵营。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从意识形态、安全利益，以及恢复国民经济、未来国家的经济建设等各方面考虑，显然也需要与苏联保持密切的联盟关系。在这一点上，斯大林与毛泽东有着目标一致的共同愿望”。^②

国际格局的力量变迁与战略互动推动了中苏同盟的形成。“中苏结盟是在双方不断协调战略利益关系并解决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中完成的”。^③ 尽管中苏两国存在结盟的共同利益，但两国的结盟之路并非一马平川。历经米高扬秘密访华、刘少奇秘密赴苏的沟通，在消除彼此顾虑、了解各自立场后，中苏两国基本上达成了结盟的原则共识。^④ 中苏同盟的建立，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对于双方而言是互利共赢。对于中国而言，安全考虑是促成中苏结盟的重要原因，毛泽东非常担心美国对中国的安全威胁特别是空中威胁。^⑤ 与苏联结盟也会获得政治和经济上的援助，还会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对于苏联而言，与中国结盟，可以把西方国家从欧洲或其他苏联

①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实际上限制了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相关研究，参见刘喜发《〈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评析》，《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3期；栾景河、李福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之比较》，《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② 沈志华、谢·冈察洛夫：《〈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第40页。

③ 牛军：《论中苏同盟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第179页。

④ 中方向苏联报告了中国对国际问题的基本看法，中共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情况。沈志华：《从西柏坡到莫斯科：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关于中苏同盟建立之背景和基础的再讨论》（之二），《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4期；牛军认为“刘少奇对苏联的访问使中共在建国前基本完成了与苏联结盟的准备，剩下的就是如何处理旧的中苏条约和是否签订新条约了，而这正是双方关系中最棘手的问题”。参见牛军《论中苏同盟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第194页。

⑤ Allen S. Whiting, “Dynamics of the Moscow-Peking Axis,” p. 100.

利益地区转移到远东,能够使苏联获得实质利益。与中国结盟也极大地提升了苏联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亚洲和第三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声望。^①但是从经济和外交的角度观察,中苏两国各自的理解则有所不同。^②利益与分歧并存也使得中苏两国在订约过程中一波三折。在是否需要订立新约以及缔结何种条约的问题上,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存在分歧。“斯大林希望与新中国结盟的方式和表现形式不致破坏雅尔塔体系以及损害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而毛泽东考虑的则是如何树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形象,如何以新型中苏关系的表现形式为榜样废除旧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③苏联此时更多的是基于权力政治而非意识形态与中国结盟。“斯大林坚持要签订秘密的《补充协定》,其目的无非是要通过消除美国、英国和日本势力在这两个与苏联接壤地区的渗透和影响,保证苏联在亚洲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④由于两者的分歧一时难以消除,这使谈判的过程异常漫长,毛泽东在莫斯科停留的时间过长也引发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诸多猜想并借机滋事。

对于美国而言,随着国民党在竞争中逐渐落败,如何确保中国不倒向苏联成为美国对华甚至是远东的重要战略目标。^⑤阻止中苏结盟成为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内容。^⑥“在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前后,美国政府内部,尤其是当时美国行政当局并不认为新中国一定会完全倒向苏联。其理由在于:(1)苏联并不认为中共是自己可靠的盟友;(2)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与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有着相当深刻的矛盾;(3)中共对美国并非没有好感;(4)1948年6月的苏南冲突事件更是刺激了美国一些官员认

① [美] 张少书:《朋友还是敌人?——1948—1972 年的美国、中国和苏联》,顾宁、刘凡、李皓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第 179、208 页。

② 沈志华、谢·冈察洛夫:《〈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第 70 页。

③ 沈志华、谢·冈察洛夫:《〈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第 40 页。

④ 沈志华、谢·冈察洛夫:《〈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第 70 页。

⑤ 时殷弘:《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与中美关系(1945—1950)》,第 9—10 页。

⑥ 沈志华:《冷战的起源:战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及其转变》,第 183 页。

为，中共在获取政权之后也会与苏联分裂。”^① 张曙光认为：“美国政府自信能够阻止中国倒向苏联，原因之一是认为中国领导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会阻碍中国与有着各种帝国主义行为的苏联建立紧密关系；二是美国政府更相信由于历史上中美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经济联系，而中国在经济上依附于美国，中共会因巨大的国内经济压力而屈服于美国。”^② 正是基于这种侥幸心理，此时的美国对华政策采取了一种虽非完全观望，但力度有限的政策，但在具体政策的制定中，美国也制定了多种预案。对于中苏关系，美国政府内部存在两种不同的估计：“一种倾向认为中苏矛盾不可克服，美国大可利用。这主要是从苏联与中共、国民党的关系分析；另一种意见认为中苏关系紧密，中国革命是以苏联为首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③ 退一步而言，对于中苏可能结盟，美国也表现出矛盾心态。一方面，一些美国政要认为中国十分孱弱，不足以对美国构成威胁，中苏结盟不足为虑。另一方面，基于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担忧，美国十分担心共产主义中国的胜利会带来亚洲的共产主义势力扩张，进而危及美国在亚洲的地位。为此，美国不得不增强对亚洲的援助。^④ 不仅美国政府内部对中苏结盟的可能性及其影响的认识存在分歧，美国舆论界同样如此。当时美国媒体与舆论圈存在两种声音。一种观点认为中苏结盟增强了共产主义的威胁，中国是苏联的附庸；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很快会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⑤

① 叶江、李少丹：《试论中苏同盟建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1949—1950年）》，《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第95页。1948年9月7日，凯南主持国务院制定《审查与定义美国对华政策的问题》PPS39备忘录，系统阐述了该部门对中共与苏联之间的关系以及对美国政策的看法。该文件认为，苏联领导人对独立性与民族主义思想较强的毛泽东一直心存疑虑，这种猜忌为美国分化中共和苏联提供了可能，因此美国应通过经济、文化、政治等手段与苏联争夺中国人的思想。虽然强调美国在挑拨中苏关系方面尚有可运作空间，但凯南同时感到，美国政府只能对未来的中苏关系产生间接作用，因而无法直接影响中苏关系的演变。参见FRUS, 1949, Vol. 8, Washington D. C.: GPO, 1973, pp. 146—155, 转引自沈志华《冷战的起源：战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及其转变》，第184页。

② 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第79—80页。

③ FRUS, 1949, Vol. 8, pp. 61—64, pp. 256—257, pp. 335—357, pp. 217—218, p. 240, p. 305, pp. 192—193, p. 250, pp. 212—214, p. 368, 转引自资中筠《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第224—225页。

④ Partha S. Ghosh, *Sino-Soviet Relations: US Perception and Policy Responses 1949—1959*, p. 45.

⑤ Partha S. Ghosh, *Sino-Soviet Relations: US Perception and Policy Responses 1949—1959*, p. 59.

美国政府内外都对中苏结盟的可能性及其影响的认识存在分歧,这也导致美国国内的对华政策出现分歧。“美国军方和国会中的部分人士从遏制苏联共产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中共持敌视态度,坚持将新中国视作苏联,同样予以遏制。不过以艾奇逊为代表的国务院,更多地从国家利益考虑,主张对华采取缓和、观望政策。国务院的意见一度占据上风”。^① 在受国务院意见影响制定的 NSC34/2 文件中(1949 年 3 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在避免干涉中国的同时,可以采取政治、经济手段利用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矛盾。^② 这实际上就是采用楔子战略离间中苏关系,阻止中苏结盟。美国政府为此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一是增加与中共的接触。随着中共不断夺取全国胜利,美国的驻华领馆承担了越来越多的情报与信息传递任务。^③ 并且,司徒雷登与中共方面的接触也是美国尝试与中共加强接触的重要证明。二是向中共释放善意。美国不仅努力与国民党划清界限,还在中苏同盟缔约谈判期间表明了其暂时放弃台湾的态度。^④ 在对华承认上持观望态度,以免把中国进一步推向莫斯科的怀抱。^⑤ 在经济贸易上继续与中国保持联系。几乎同时出台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NSC41 号文件,详细阐述了美国应当如何利用各种贸易手段防止苏联控制中国,基本上持一种相对柔和的对华贸易政策。三是针对中苏同盟缔约谈判施加影响。“在中苏谈判期间,美国不断公开抨击苏联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企图,涉及领土问题与在华特权。同时也寻求通过宣传战来实现目的,国务院通过各种渠道散布了苏联企图贿赂毛泽东的谣言”。^⑥ 毫无疑问,美国的上述举措起到了作

① FRUS, 1949, Vol. 7, pp. 1138 - 1141.

② FRUS, 1949, Vol. 9, pp. 494 - 495.

③ 叶江、李少丹:《试论中苏同盟建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1949—1950 年)》,第 96 页。

④ 1950 年 1 月 5 日,杜鲁门以总统名义公开阐述美国对台湾地区的政策。参见《美国总统公开文集:哈里·杜鲁门》,1950 年,第 11—12 页;《美国对外关系文件汇编》(1950—1955),第 2248 页。

⑤ 资中筠:《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第 238 页。

⑥ Marvin L. Kalb, *Dragon in the Kremlin; a Report On the Russian-Chinese Alliance* (New York: Dutton, 1961), p. 70. 关于美国对新中国实施的企图分化中苏关系的宣传政策可参见 FRUS, 1950, Vol. 6, pp. 294 - 296, pp. 308—309. 转引自资中筠《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第 249 页。

用。毛泽东意识到了美国这位敌人的动作并加以利用，苏联也对美国分化中苏同盟的楔子战略有所警惕并在中苏谈判中更加妥协。^① 不过美国的政策也是软硬兼施，不愿一味对华释放善意，如 NSC34/2 号文件建议，如果中共采取的政策损害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将使用其强大的实力教训中国。^②

美国阻止中苏同盟形成的楔子战略以失败告终。关于失败的原因，沈志华认为：“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在与中共的交往中表现得十分被动。就其为破坏中苏同盟而采取的政策而言，其演变有着较为清晰的轨迹：从一开始的以打压为主、接触为辅，逐步转变为以利诱为主、打压为辅。但无论怎样，美国在整个过程中极少占据主动，也未能阻止中苏同盟形成。实力强大的美国之所以会失败，首先是因为它极少接触中共，对共产主义抱有根深蒂固的偏见，根本不了解中共在此问题上的基本态度和目标；其次是美国政府在制定和执行相关政策时，难以摆脱国内右翼反共势力和中国国民党的干扰，因此无法做出有效的应对。”^③ 而牛军则认为美国的楔子战略必然失败，“因为当时中共领导人的观念认为，在尖锐对立的世界格局中，任何政治力量都必须决定自己站在哪一方。新中国可以与美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但要排在苏联的后边，而且美国必须放弃敌视中共的政策，并以被认为是平等的态度对待新中国，显然这是难以实现的。”^④ 由此可见，沈志华的观点是认为美国没有把握好阻止中苏结盟的机会，而牛军的观点则认为美国根本没有机会。无独有偶，在美国国内也存在美国在中国到底是失去机会还是没有

① 苏联方面对美国分化中苏的楔子战略有所警觉。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苏联就得到消息说，美国曾经有一个把中共变成第二个铁托集团的计划，目前美国间谍机构在华活动的首要任务就是破坏中苏之间的友谊。此后，莫斯科又不断收到类似的情报。而这些也确实迫使斯大林在中苏同盟条约签署时做出让步。斯大林在中苏同盟谈判时之所以两次被迫做出让步，固然与毛泽东毫不退让的强硬态度和周恩来的机动灵活的外交手段有关，但主要的因素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美国的压力。转引自沈志华《冷战的起源：战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及其转变》，第 252 页。

② FRUS, 1949, Vol. 9, pp. 826–834.

③ 沈志华：《冷战的起源：战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及其转变》，第 207 页。

④ 牛军：《论中苏同盟的起源》，第 192 页。

机会的争论。^① 美国学者则认为中美能否形成一种非对抗的关系取决于两点：一是美国能够承认中国并支持其经济建设；二是苏联在中国内战时期对中共的援助有限导致中苏关系存在风险。^② 这也表明美国想要争取中国的难度不小。张少书认为，美国阻止中苏结盟失败的原因在于杜鲁门的对华政策一直是建立在夸大自身重要性和对中国友好，而对莫斯科恶毒基础之上的。政府官员从未意识到中国对美国支持蒋介石和继续与他保持联系的憎恶之深。杜鲁门政府为使北京与莫斯科的分裂所进行的努力，只能证明美国不甘中国的革命胜利，这使中国领导人感觉到与莫斯科的联合更具价值。^③

上述观点从意识形态、国内政治、战略成本等方面解释了美国阻止中苏结盟的楔子战略缘何失败。从战略评估的角度来看，美国分化中苏同盟的楔子战略之所以失败，在于战略目标、战略资源和战略手段之间的严重失衡。美国阻止中苏结盟的战略目标相对较高、难度较大，特别是在中苏之间存在巨大结盟利益的情况下。美国的战略目标并不明确，阻止中苏结盟的战略目标存在诸多变数。与欧洲相比，远东当时并非美国的战略重心，美国不愿中国成为苏联的盟友，但并未做好阻止中苏结盟的持久准备，从其所采取的观望政策可见美国的复杂态度。既不愿意中苏结盟，又不愿意给予中国大量援助以阻止这一趋势。“不过当时美国的实力也不足以在欧亚两端同时采取大规模的援助行动以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扩张。”^④ 犹豫不决的战略目标和捉襟见肘的战略资源导致美国的战略手段严重不足，与中共互动有限，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国内反共的政治生态更是让美国缩手缩脚，因而失败实属必然。

① Robert Ross and Jiang Chang Bin, *Re-examining Cold War-U. S. -China Diplomacy: 1954 - 1973*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32; 斯蒂芬·戈德斯坦：《失去机会，还是根本没有机会》，载袁明、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约瑟夫·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

②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p. 38.

③ [美] 张少书，《朋友还是敌人？——1948—1972 年的美国、中国和苏联》，第 78 页。

④ 金海：《战后初期美国保守主义权势集团对杜鲁门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第 152 页。

四 联盟分化：美国离间中苏同盟（1950—1956 年）

在中苏同盟形成前，美国就意识到了中苏之间存在种种隔阂、矛盾与冲突，也认为美国在阻止中苏同盟形成方面存在成功的可能，不过对此并不抱太乐观的态度。美国也为中苏同盟的形成制定了预案，希望在未来能够分化、削弱甚至瓦解中苏同盟。美国分化中苏同盟的楔子战略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1950—1956 年，中苏同盟内部没有出现较大的意识形态分歧，对美战略比较一致，美国分化中苏同盟的楔子战略采取了对中苏共同施压的方式。第二阶段是 1956—1964 年，中苏开始出现意识形态分歧并愈演愈烈，更为重要的是导致中苏对美战略出现分歧，美国分化中苏同盟的楔子战略调整为对中苏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一拉一打导致美苏缓和、中苏交恶，中苏战略分歧加剧，中苏同盟深受重创。相对而言，第二阶段的效果更为有效。

中苏签署同盟条约和朝鲜战争都是促使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重要事件，也是推动美国对华政策日趋强硬的重要原因。从目前的档案来看，中苏同盟的形成使得美国认为短期内分化中苏同盟的希望渺茫，这也导致美国国内主张对华接触政策的声音处于下风，但并不否认美国可以尝试采取对华接触政策以促使中美关系转圜，不过朝鲜战争的爆发改变了这一可能。^①“中苏结盟后，美国政府希望在短期之内分裂中苏同盟的政策已经失败，未来的政策是继续以挑拨中苏关系为中心还是彻底改弦更张，美国政府内部存在争论，最终以军方为代表的对华强硬派逐渐占据上风，美国对华政策及远东政策开始定型。不过艾奇逊国务卿仍然对分离中苏同盟的楔子策略情有独钟，并未完全放弃。此后的 NSC68 号文件基本上奠定了美国新的对华政策的基调，提出了全面、无差别遏制的概念。”^②但 NSC68 号文件只是奠定了美国对华强硬政策的基调，并未就对华具体政策

① 关于朝鲜战争对中美苏三国的影响可参见沈志华《中苏朝：一场战争与三角同盟——重看中俄解密档案》，《同舟共进》2009 年第 9 期。

② 沈志华：《冷战的起源：战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及其转变》，第 190—191 页。

做出明确规定。由此可见,中苏同盟的形成导致美国国内开始酝酿对华政策调整,但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才完全确立对华强硬政策,试图通过全面施压的对抗性楔子战略来来分化中苏同盟。

中苏同盟的形成导致美国对华政策趋向强硬,并且因为美国国内的麦卡锡主义的影响、加之朝鲜战争爆发,使美国对华强硬政策在短期无转圜的可能。既然阻止中苏结盟失败,美国为此制定了分化中苏同盟的总体方针,将原有的对华政策的强硬一面延续并强化。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兵戎相见,中苏同盟也因为战争变得更加紧密。但美国方面对于中苏同盟的认识并无多大变化,认为其未来的分裂仍不可避免,美国仍然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促成这一变化。美国政策评估认为:“朝鲜战争增加了中共对苏联的依赖性,但显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苏关系。中苏同盟依然存在许多相互冲突的领域。”^① 美国情报评估认为,中苏两国间缺少如美英两国间那样强大的文化与传统的共性,并且两国之间存在一条漫长的边界。这些特点使得中苏之间埋下了分歧的种子,中苏之间存在着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② 具体而言,美国情报界认为中苏可能出现分歧的原因有四个方面:“(1)对新疆、满洲等中国边境领土的控制;(2)对朝鲜的最终控制;(3)苏联向中国共产主义政府渗透并试图控制它的努力;(4)苏联不能满足共产党中国的经济、军事需要。”^③ “1952年8月10日,中情局指出:“通过对已有证据评估可以得出结论:中国与欧洲卫星国不同,它并没有被苏联直接、完全地控制住。”^④ 朝鲜战场上的并肩作战并不能解决中苏之间的诸多分歧。“中苏集团背后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分歧、猜疑和竞争。

① *FRUS*, 1951, Vol. 1, p. 151.

② Geneva Conference Background Paper, “The Sino-Soviet Relation and Its Potential Sources of Differences,” April 6, 1954, Confidential, p. 1, MF2527253 - 0971, Main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③ CIA, “NIE-10: Communist China,” January 17, 1951, Secret, pp. 1 - 2, DDRS, CK3100168237 - CK3100168242.

④ CIA, “Relations Betwe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and The USSR: Their Present Character and Probable Future Courses,” August 10, 1952, Secret, pp. 3 - 4, DDRS, CK3100174684 - CK3100174697.

事实上，中苏对北朝鲜的支持代表着两个共产主义巨人之间早期的敌对态度：两个巨人，谁也不肯让对方单独控制北朝鲜。”^①由此可见，朝鲜战争并未改变美国对中苏同盟性质的根本认知，认为中苏同盟内部存在诸多分歧，美国存在分化的可能，美国对中苏同盟的认知分歧更多地表现在同盟持续时间的长短。^②总体来看，认为中苏同盟在近期不太可能破裂，但不排除未来破裂的可能性意见占据上风。1953年4月6日，NSC148号文件《美国对远东的政策》指出，美国在远东地区的首要威胁是中国。“美国在远东的中期目标是通过分裂中苏关系，使中国不再成为苏联政策的一个有效工具，减少苏联在该地区的力量和影响。美国在中国的最终目标是在中国产生一个对美国友好的、非共产党的政府。文件认为，实现上述目标可以有两种手段：一是使北平政权远离莫斯科，另一种办法是推翻北平政权，代之以敌视莫斯科的中国政府。文件进一步指出，美国目前不一定非要在两者之中选择一种方案，明智的办法是在不直接对共产党中国进行干涉的条件下，增加对共产党中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压力”。^③基于对中苏同盟的评估，美国决定采取对抗性楔子战略分化中苏同盟。美国分化中苏同盟的政策设计者杜勒斯认为：“加剧共产党中国与俄国之间的紧张和异议的最大希望是使中国人处在最大限度的压力之下，而不是通过减轻这种压力……压力和紧张将迫使他们向苏联提出更多的、苏联无法满足的要求，结果使紧张进一步加剧，这才是应该遵循的路线，而不应该通过与俄国展开某种看谁对中国最好的竞争来试图分裂中国人和苏联人。”^④1953年11

① 约翰·兰尼拉格：《中央情报局》，潘世强、范道丰、李中、黄景让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606页。

② 从1950年代开始，中央情报局就准确地考察到中苏之间的冲突。由于20世纪60年代这种分裂越演越烈，中央情报局对中苏关系的研究极力加强了它在华盛顿外交决策中的地位。引自约翰·兰尼拉格《中央情报局》，第607页。

③ *FRUS*, 1952-1954, Vol. 12, pp. 287-289, p. 294.

④ Dwight D. Eisenhower Papers, Ann Whitman File, International Meetings Series, Box 1, "Bermuda-State Department Report," Dwight D. Eisenhower Library. *FRUS*, 1952-1954, Vol. 5, pp. 1808-1818, 转引自约翰·加迪斯《美国的政策与看法：1949—1955年分裂中苏的“楔子战略”》，载袁明、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第248页。

月 6 日,艾森豪威尔批准了一份名为《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的 NSC166/1 号文件,确立了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对华全面施压的政策方针。^① 1954 年底,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表达了类似看法,认为分化中苏同盟的最佳途径是最大限度地增加中共对苏联的依赖。^② 至此,美国分裂中苏同盟的对抗性楔子战略也基本确立。尽管美国对华采取软硬兼施的楔子战略有可能效果更佳,不过美国之所以一直对华采取高度施压的对抗性楔子战略,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美国判断中苏同盟未来肯定会出现分裂,但美国对此能够施加的影响有限。在阻止中苏结盟失败后,美国对中苏同盟进行了评估,认为分裂中苏同盟短期内几无可能,但长期内很有希望。对于分裂中苏同盟,美国政策界认为中苏同盟的分裂主要取决于内因,美国对此的影响有限。因而美国即便努力和中共领导人之间达成谅解也不能加速中苏同盟分裂。^③ 美国政策界认为,对中共实行强硬的、强制性的政策会有效地破坏中苏同盟,这一想法成为华盛顿可以接受的明智之举。^④ 正是基于这种消极的态度,美国才一味地对华高度施压,谋求以压促变。相比于奖赏政策,惩罚性政策付出的成本较低,风险也相对较小。

二是意识形态敌对与国内政治的影响。意识形态的对立使得美国视中国为威胁,并非常担忧中共在亚洲推行共产主义扩张。在当时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限制下,美国对中共的友好政策将被背上“绥靖”的骂名,美国国内政治对美国的对华施压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战争期间,蒋介石政府培植了一群美国的支持者,形成了强大的“院外援华集团”。国会“台湾帮”极力阻止美国对中共采取任何友好举措,并不断推动美国援助台湾,帮助台湾反攻大陆,美国继续与国民党维持友好关系无疑损害了其与

① *FRUS*, 1952 - 1954, Vol. 14, pp. 278 - 306. 转引自于群《论美国对华经济遏制战略的制定与实施》,第 21 页。

② *FRUS*, 1952 - 1954, Vol. 9, pp. 911 - 919.

③ [美] 张少书:《朋友还是敌人?——1948—1972 年的美国、中国和苏联》,第 18 页。

④ [美] 张少书:《朋友还是敌人?——1948—1972 年的美国、中国和苏联》,第 77 页。

中共关系缓和的可能。

三是美国的示好政策无助于分裂中苏同盟。采取楔子战略分化中苏同盟，美国可以采取“胡萝卜”和“大棒”的威逼利诱两手，不过美国自始至终主要采用“大棒”政策，其原因还在于美国认为“胡萝卜”政策无助于分裂中苏同盟。中苏同盟形成后，美国认为示好也无益于改善两国关系。艾奇逊发现英国的对华温和政策并未导致中英关系明显的改善，北京因英国继续维持与中国台湾的关系而指责英国政策的两面性。^①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国内主流意见认为中苏同盟不会由于西方国家对华利诱、妥协而减弱，却会因为西方的不断施压而受到削弱。^② 杜勒斯则认为，分裂中苏的最佳途径是保持继续对中共施压，只要中共与苏联还保持同盟关系，就不让它们有好日子过，铁托之所以与斯大林决裂，不是因为我们对铁托很好，正好相反，我们对铁托十分粗鲁苛刻。^③ 美国基于对南斯拉夫政策的经验，认为只有对中国强硬、粗暴、凶狠一些，中苏同盟才有可能分裂。

四是朝鲜战争恶化了中美关系。朝鲜战争导致中美兵戎相见，也导致中苏同盟更加紧密。战争的敌我关系使得美国对华政策变本加厉，原本可能采取的缓和政策毫无可能。主张对华温和的国务院在与军方、国会的政策竞争中失势。美国认为，朝鲜战争虽短期内促进了中苏同盟的团结，但中国声望渐起而不受苏联控制，这有可能令莫斯科不安。因而建议继续对中国施加压力，这有助于中苏产生严重分裂。^④

为了实施分化中苏同盟的对抗性楔子战略，在具体政策方面，美国政府对中苏几乎一视同仁地采取了对抗性楔子战略，对中国实施了政治孤立、军事包围、经济封锁等战略手段。^⑤

一是政治上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寻求分裂中苏同盟关

① [美] 张少书：《朋友还是敌人？——1948—1972 年的美国、中国和苏联》，第 68 页。

② NIE-58, “Relations betwe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and the USSR: Their Present Character and Probable Future Courses,” *FRUS*, 1952-1954, Vol. 9, pp. 97-104.

③ [美] 张少书：《朋友还是敌人？——1948—1972 年的美国、中国和苏联》，第 85 页。

④ [美] 张少书：《朋友还是敌人？——1948—1972 年的美国、中国和苏联》，第 90 页。

⑤ 张小明：《美国对中苏同盟的认识与反应》，《历史研究》1999 年第 5 期，第 51 页。

系。虽然此前美国还曾考虑以对华承认来诱惑中国疏远苏联,但在阻止中苏结盟失败后,美国政策界的主流意见是不承认新中国并对其持敌视态度,甚至希望诱导中国人民变更共产党政权。^①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放弃了此前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转而支持扶植国民党政权,并阻止、干预其他西方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也导致中国不得不主要与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民族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与西方国家的联系较少。

二是军事上不断施加压力。一是通过组建“东南亚条约组织”等加强对华军事围堵。中苏结盟、朝鲜战争的爆发推动了美国远东军事力量的加强,不仅组建了美日、美韩多对双边军事联盟,还撮合其他国家组建了“东南亚条约组织”。美国希望通过对华军事围堵能够阻遏共产主义在亚洲的蔓延。二是对华核威慑是美国对华军事施压的典型代表。美国对华多次进行核威慑是促成中国发展核武器的重要原因,而中苏在中国发展核武器问题上矛盾不断又构成中苏同盟破裂的重要原因。尽管核威慑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美国分化中苏同盟的楔子战略的非意图性后果,但其作用却客观存在。尽管如此,美国对华核威慑对分化中苏同盟的影响却不容忽视。没有美国核威慑对中国所施加的巨大安全压力,中国不会如此迫切地寻求发展核武器,中苏同盟也不会因为发展核武器而分歧严重,矛盾不断。

三是经济上加强封锁和贸易管制。美国认为对华经济制裁在敌对和战争时期都应该严厉执行。在敌对期间,保持严格的经济封锁、对海外支持共产党中国的情况进行严格限制;进行选择性的、有限的预防性购买,阻止中国获取用来改善其国际贸易地位的海外资产。在战争期间,阻止其获取任何战略资源。在巴黎统筹委员会下还设立了中国委员会,实行“中国差别”的苛刻管制。^②不过在对华贸易管制方面,美国与盟友之间也存

^① *FRUS*, 1952 - 1954, Vol. 2, No. 1, p. 427.

^② “美国及其主要盟国对共产主义中国所实行的贸易管制措施,目前没有必要与美国及其主要盟国对欧洲的苏联集团所实行的贸易管制措施相同,美国及其主要盟国应该逐步对苏联集团的所有国家采取共同的贸易管制水平,其中会考虑到苏联和共产主义中国在进一步发展各自的战争潜力上的不同需求。”引自 *FRUS*, 1952 - 1954, Vol. 12, p. 1069.

在分歧，需要对此进行协调。美国对华经济施压是對抗型经济类楔子策略的重要手段，其严格程度高于美国对苏东国家的贸易管制，给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困难，虽然在短期内增加了中国对苏联的依赖，但在长期内却导致中苏因经贸矛盾齟齬不断。因为中苏两国对于彼此间的经贸合作存在不同认知，进而导致相互埋怨，这成为中苏同盟破裂的潜在隐患和助燃剂。

四是展开宣传攻势，实施离心伎俩。美国也不断采取宣传战和心理战来分化中苏同盟。通过嘲弄矮化毛泽东对苏联的屈服来激起中国的民族主义；通过宣扬苏联的侵略性及其对中国西藏、新疆等地的野心来抹黑苏联在中国民众心里的形象。^①

当然，美国政府也尝试通过压力以外的其他手段谋求离间中苏同盟。1953年3月，保罗·尼采建议美国利用斯大林去世之机解决朝鲜停战问题，借此有可能会离间毛泽东和马林科夫的关系。^②1954年4月，艾森豪威尔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可以利用同中国的贸易来离间中苏同盟，但这些想法最终并未付诸实施。^③

总体来看，中苏同盟形成后，美国分裂中苏关系的“楔子战略”经历了第一次调整，其战略重点由“拉”转向“压”，其对华政策由“等待”“观望”转向敌视、遏制、封锁和包围，即实施“以压促变”的楔子战略，以高压政策促使中苏分裂。^④美国分化中苏同盟的对抗性楔子战略的战略机制比较清晰，即通过向中国不断施加各种压力，增加中国的困难。中国为了解决诸多困难而寻求盟友苏联支持，但苏联并非有求必应，在中苏同盟的援助中供需方面的矛盾不断影响联盟关系，导致中苏两国对于联盟的权责分配出现分歧，联盟矛盾不断，加之中苏之间存在历史问题和利益分歧，必然会影响联盟关系。不过这一阶段美国分化中苏同盟的楔子战

① *FRUS*, 1952-1954, Vol. 2, No. 1, p. 425.

② “Paul Nitze to the Secretary, Subject: Exploitation of Stalin's Death,” March 10, 1953, PPS1947-1953, Box 45, NA.

③ Gordon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06-109.

④ 胡晓丽：《美国的“楔子战略”与中苏分裂》，第79页。

略的实施效果并不明显，一是朝鲜战争增加了中苏同盟的团结；二是美国对中苏采取一视同仁的对抗性楔子战略使得中苏同盟比较团结，尽管偶有摩擦，但不至于同盟分裂。不过自从 1956 年中苏出现意识形态分歧导致对美战略出现差异后，美国的楔子战略再次进行了调整，战略效果也更加明显。

五 促进分裂：美国分化中苏同盟（1956—1964 年）

1950—1956 年，中苏同盟关系融洽，虽然偶有摩擦，但中国对苏联的不满主要源自苏联的大国大党主义，意识形态分歧尚未出现。1956 年，中苏同盟内部出现了重大变化，中苏两党的意识形态分歧开始出现，由此导致两国的国内政策与国际战略出现分歧，这也为美国分化中苏同盟的楔子战略提供了良机。与此前美国分化中苏同盟的楔子战略以中国为突破口，通过全面施压致力于分裂中苏同盟不同。1956—1964 年，美苏关系有所缓和，美国对中国进行冷处理，以苏联为突破口，通过对中苏区别对待来实施楔子战略。^① 尽管中苏两国还存在巨大的共同利益，但在美国对中苏软硬分施的情况下，意识形态分歧对中苏同盟的破裂作用凸显。

1953 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内政外交进行了重大调整。在对外政策方面，赫鲁晓夫谋求美苏关系缓和，不过美国一开始对苏联释放的和平善意并不理睬且疑虑重重，认为这是苏联的“烟雾弹”，赫鲁晓夫与斯大林没有区别。^② 此后苏联在土耳其、奥地利、德国等欧洲安全问题上做出让步，使得美国尝试与苏联进行缓和接触。随着赫鲁晓夫国内统治地位的逐渐巩固，其变革的步伐加快，由此也导致中苏意识形态分歧加大。中苏的意识形态分歧主要集中在斯大林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共处问

① 宋晓芹、李莉：《试论 1949—1959 年中苏关系中的美国因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 年第 4 期，第 66 页。

②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第三册），樊迪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第 82—84 页。

题、和平过渡问题。^① 特别是“三和”问题影响到中苏对于国际问题和美国政策的看法，对中苏同盟产生了重要影响。围绕这几大问题，中苏意识形态分歧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到1958年台海危机。该阶段中苏同盟意识形态分歧开始出现，但对同盟的负面影响不算太大，美国开始意识到中苏同盟内部的不和，并逐步调整此前对中苏的一视同仁政策。中苏意识形态分歧始于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如何评价斯大林。不过此后的东欧危机对中苏关系和意识形态论争起到了调和作用。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上，中苏虽有分歧，但总体和睦。当然这不能排除赫鲁晓夫因为国内的政治斗争需要中国的支持。不过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对核战争的态度还是让赫鲁晓夫不安。尽管中共对核战争的态度主要是从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但也导致此后中苏在核合作上出现重大分歧。

1958年中苏关系因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出现矛盾。这两件事表明苏联想加强对中国的控制，将中国纳入到美苏竞争当中，削弱中国的战略独立性。^② 不过这两件事在当时对于中苏同盟的影响并不算大。^③ 真正使中苏同盟恶化的是炮击金门事件，这反映了中苏对美的政策分歧，也是两国基于对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共处等意识形态分歧的产物。1957年，赫鲁晓夫在巩固国内统治地位后更加积极地推进美苏缓和。而中国对此有不同的态度。“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做出了过于乐观的判断，认为‘东风已经压倒西风’，因此提出对资本主义阵营应该采取

① 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963—1964年人民日报发表的“九评”的主要内容。

② 李捷：《中苏论战与中苏关系》，《东欧中亚研究》1999年第5期，第23页。

③ 沈志华认为这两件事涉及双方对军事同盟运作方式的理解，不过之后同盟运作方式基本按中国的方案达成协议，因而当时这对中苏同盟影响不大。这可以从原本秘密访华的赫鲁晓夫以公开姿态离开中国，中苏两国还发表了联合公报得到佐证。参见沈志华《中苏同盟破裂的直接表现与内在逻辑——对中央情报局“国家情报评估（NIE）”的评估》，《国际观察》2005年第5期，第9页。

更加强硬的进攻政策。中国对美国的方针从‘和平共处’转变为‘绞索政策’，这也导致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开始出现了与莫斯科之间的分歧。”^① 苏联要求缓和，中国则制造紧张，苏联希望和平环境，中国则鼓动革命情绪，中苏对美政策出现分歧与中苏两国所处的国内、国际环境、发展阶段有关，也是两党意识形态分歧的重要影响因素。不过当时美国对于中苏意识形态分歧的判断并不准确。1956 年 3 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提出了“利用中苏分歧瓦解中苏同盟”的观点。^② 1957 年的情报评估认为，尽管这一时期美国已经发现中苏同盟中的一些已有或潜在的矛盾与分歧，但依然认为中苏之间存在牢不可破的同盟关系，并预测中苏同盟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改变。^③ 在采取具体应对政策方面，美国虽然没有调整其对华政策，但其对苏政策的细微调整使得此前美国分化中苏同盟的楔子战略，从对中苏共同施加向对中苏“一压一和”转变，美国试图用区别对待的办法增加中苏分歧，从而使苏联因对中国的不满增加而“抛弃”中国。^④

第二阶段是 1958 年台海危机后到 1960 年 6 月布加勒斯特会议。这一阶段中苏意识形态分歧加大，美国对中苏区别对待的楔子战略加剧了中苏同盟在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受此影响，两国在国际战略与对美政策上的分歧更加明显。

1958 年的台海危机凸显了中苏对美政策的重大分歧。中国在事先没有通知苏联的情况下炮击金门引起苏联的强烈不满。尽管后来苏联在摸清了中国的底牌后，表态坚定支持盟友，显示了中苏同盟的团结。但苏联对中国的冒险政策十分担忧。在急于缓和苏美关系的苏联领导人看来，金门

① 沈志华：《美国中央情报局眼中的中国——冷战时期美对华情报评估综合性文件概述》，《史学月刊》2009 年第 1 期，第 94 页。

② *FRUS*, 1951, Vol. 6, p. 228.

③ CIA, “Relations Betwe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and The USSR: Their Present Character and Probable Future Courses,” August 10, 1952, Secret, p. 5, DDRS, CK3100174684 - CK3100174697.

④ Gordon H.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Soviet Union, 1948 - 1972*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43 - 144.

炮战是在破坏苏联的缓和战略。^①危机过后，赫鲁晓夫不断通过影射攻击中国，中苏意识形态分歧加剧。1959年初，苏共“二十一大”召开，进一步明确了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为核心的对美缓和战略，中苏对美政策分歧进一步加大。赫鲁晓夫还加强了对中共的批评。中国决定考虑予以回应，但基本上持不论争、不扩大负面影响态度。^②中国清醒地认识到，尽管中苏存在分歧，不过中国还是以团结为重，并且对台海危机中中国面临美国核威慑、缺少核武器的现实也有清楚认识，并希望苏联能够援助中国的国防建设。^③

不过对意识形态分歧的克制并不能阻止中苏同盟的矛盾加深。美苏缓和与中美对抗对中苏同盟产生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步显现。赫鲁晓夫为了推动美苏缓和，开始了对美国的访问，并对中国的激进行为进行指责，这对中苏同盟产生了重大的破坏。为了显示苏联的和平诚意，苏联决定加强对中国的控制，与中国划清界限。一是中断与中国的核合作；二是在中印边界冲突上指责中国。前者被中共领导人认为是苏联为了美苏关系缓和而牺牲中国的利益。后者则引起中共的强烈不满，导致中苏分歧公开化。这两件事是赫鲁晓夫访美前的得意之作，也表明美苏合作损害了中苏同盟。^④

赫鲁晓夫访美时以推动美苏缓和为大旗，其间涉及中国问题。赫鲁晓夫在访美之后立即访华，劝说中国领导人放弃冒险主义，不要和美国进行对抗，希望中国主动采取一些措施，在台湾问题、美国囚犯问题上做出让步。不过这些提议遭到中国的拒绝，这引起了赫鲁晓夫的十分不满。这也反映了中苏对于美国的不同看法与政策分歧。苏联认为美国也是爱好和平

① 李捷：《中苏论战与中苏关系》，第24页；沈志华：《中苏同盟破裂的直接表现与内在逻辑——对中央情报局“国家情报评估（NIE）”的评估》，第10页。

② 1959年2月1日，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认为我们同赫鲁晓夫的关系，还是“十个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就是有一个不同，其他九个相同。1959年9月11日，毛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再次强调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要以团结为重。可见，对于赫鲁晓夫对中共的指责与批评，中共还是采取克制的方针，尽量避免分歧公开化。

③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第119—120页。

④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第140页。

的, 美苏可以和平共处。中国则认为美国的本质没有改变。对此中国的应对是减少常备力量, 加强尖端武器, 主要是核武器和导弹, 并且要对美国的战争与和平两手保持警惕。^①

赫鲁晓夫回到苏联后开始实行和平计划, 并号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向苏联看齐、对表, 对中国的不配合行为展开攻击。为了推行和平计划, 赫鲁晓夫一方面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整合起来, 促成四国首脑会谈, 另一方面攻击、孤立中国。中国领导人认为苏联为了与西方妥协, 要迁就西方, 要以反对中国来讨好西方, 实际上是牺牲中国的利益来实现美苏缓和。^②四国首脑会议上, 美苏不欢而散, 中共对苏联采取支持态度, 希望能够缩小意识形态分歧, 改善同盟关系。^③不过中共顾全大局的做法并未得到苏联的回报。1960 年 6 月, 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 中苏两党相互点名批评, 中苏意识形态分歧公开化。

对于这一阶段的中苏分歧, 美国的情报评估逐渐客观明朗。1958 年 9 月, 国务院的情报评估认为, 中苏同盟出现了他们此前所预见的分歧, 并且未来中苏同盟可能在五个领域出现分歧: (1) 台湾; (2) 核武器; (3) 经济关系; (4)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5) 与西方的关系。^④但对中苏分歧对于中苏同盟的影响的评估比较保守。1959 年的情报评估认为, 尽管中苏同盟在某些领域的紧张关系加剧, 但这并不意味着同盟关系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⑤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判断, 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情报界主要从国家利益角度分析同盟关系, 由于当时中苏存在巨大的共同利益, 中国在经济、安全上对苏联有依赖, 因而判断中苏虽有分歧,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 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 第 148、152 页。

② 吴冷西:《十年论战: 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 第 162 页。

③ 中国发表多篇评论支持苏联, 并在 5 月 20 日在首都发动了 120 万人的群众游行示威支持苏联。

④ Department of United States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IR7800: Divisive and Cohesive Elements in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September 15, 1958, Confidential, pp. 18, MF2510409 -0106, Main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⑤ Department of United States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Recent Developments in Sino-Soviet Relations,” Secret, p. 20.

但同盟依然牢固。尽管美国情报界对于中苏分歧的了解增多，但对于如何利用中苏分歧，却提不出明确的针对性政策建议。1959年，国务院情报研究署署长卡明在向政治事务副国务卿墨菲提交的备忘录中，讨论了美国针对中苏分歧的政策。他认为：“当美国公开探究苏联和中共之间可能出现的分歧时，都会使它们决定公开表现同盟牢固的基础……（随后）他们很可能会采取行动来减少分歧，以加强反对西方的共同阵线。”因此，卡明主张对中苏分歧采取不公开关注的方式。^① 美国政府此时对于中苏意识形态分歧主要是静观其变，不主动采取过于明显的政策。^② 因此，这一阶段，中苏同盟内部分歧加剧，但美国对于其结果的评估不太确定，在对华政策上没有调整，但美苏关系却有所缓和。具体做法如下。一是在不放弃经济冷战政策的前提下，适当松动西欧与苏联的经贸关系；二是启动与苏联的核武器禁试谈判，防止包括中国在内的第四国成为核俱乐部成员；三是邀请赫鲁晓夫访美，以美苏缓和离间中苏关系。^③ 而对华政策依然是实施全面施压的对抗性楔子战略，导致中苏对美政策认知与应对分歧加大。不过美国虽然没有刻意调整对华政策，但对苏政策的适当调整使得此前对中苏共同施压的楔子战略出现了变化，战略效果也更加明显。

第三阶段是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到1963年9月的公开论战。这一阶段中苏意识形态分歧加剧，美国对中苏区别对待的政策更加加剧了中苏对美认知分歧。中苏意识形态几经调和无效，中国开始更加注重自助能力提升，在核武器问题上与苏联分歧扩大，中苏同盟逐渐走向瓦解。

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中苏两党进行了公开的争吵，意识形态分歧公开化。由于中苏两党都是执政党，两党分歧必然影响到两国

① 陶文钊、牛军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第三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第501—502页。

② 陶文钊、牛军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第三卷），第519页。

③ 宋晓芹、李莉：《试论1949—1959年中苏关系中的美国因素》，第71—72页。

关系。苏联随后撤走了在华专家和撕毁合同，中苏同盟深受重创。“布加勒斯特会议后，中共的态度也有所改变，认为要做好与赫鲁晓夫长期斗争的准备。中央采取的方针依然是坚持团结、坚持原则，尽力来推迟中苏两党、两国公开破裂的时间，但是也不怕分裂，也要准备应对分裂。”^① 1960 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上，中国开始强调自力更生，加强了对苏联的反击。这与苏联加强对中国的经济制裁有关，同时也表明中国对中苏同盟的破裂也有所准备。北戴河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要对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联散发的《通知书》做全面的、系统的批驳，中共发表《答复书》，中苏意识形态分歧进一步激化。^② 1960 年 9 月的中苏两党举行会谈，试图缩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但会谈争吵不断，两党关系处于破裂边缘。^③ 尽管后来中苏两党克服困难，达成了协议。但好景不长，1961 年 8 月到 9 月，苏共“二十二大”确立了继续推行美苏缓和的政策，并坚持对斯大林全面否定，中苏意识形态分歧更加严重。此后的中印边界冲突和古巴导弹危机则进一步加剧了中苏同盟的分裂，也凸显了中苏在“三和”问题上的意识形态重大分歧。古巴导弹危机后，苏联不再需要中国支持，于是迁怒中国。^④ 苏联不断支持各国共产党批评中国，中苏之间开展了间接论战。此后中苏协商停止公开论战，但未能达成共识。1963 年 7 月 14 日，苏共发布《公开信》，作为对中共 6 月 14 日信件的答复，并直接点名攻击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表明中苏分歧不可调和。1963 年 7 月的中苏和谈不欢而散，中苏意识形态分歧公开化，此后进入激烈的中苏论战。

随着中苏分歧的逐渐公开化，美国对此的认识也更加客观。中情局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第 201 页。

②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第 227 页。

③ 中共代表团认为，如果真的分裂，后果无非是：一是苏联继续反华；二是苏方继续断绝对我们的一切援助，东欧兄弟国家也照办；三是苏共及其随从断绝同我党的关系；四是外交上对我们实行封锁，国家关系破裂；五是在国际组织里面把我们完全孤立起来；六是对帝国主义、民族解放运动、国际工人运动各搞一套。这些后果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压不跨我们，事实上，赫鲁晓夫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这样做了，只是没有完全做绝而已。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第 257 页。

④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第 324 页。

1960 年的报告认为，中苏双方分裂的因素存在并可能发展，中国力量的增强会削弱苏联对中国的控制，不过中苏关系中的凝聚力量要强于分裂力量，这是基于中苏共同利益和中国对苏联的依赖的判断。^① 1961 年 12 月，美国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报告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坚如磐石的团结与控制已不复存在，中苏分歧尖锐化的影响国际共运。1963 年 5 月，中央情报局评估报告认为，“中苏之间的分歧目前已无法调和，公开辩论有时可能会熄火，但我们不认为会发生基本的和解，中苏关系会继续紧张下去，对社会主义阵营产生重要影响”。^②

尽管 1960 年的美苏首脑会晤不欢而散，1962 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导致美苏处于核战边缘，但美苏缓和随后却出现了新的进展，开始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防止核扩散条约和限制战略武器扩散等谈判。而中美关系依然恶劣，肯尼迪政府将中国视为比苏联更富侵略性的敌人；中国则指责苏联的修正主义错误，在部分禁止核武器谈判上进行美苏联合反华。“美苏缓和与中美、中苏关系的恶化同时存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形成了美苏联合对付中国的局面。”^③

自 1963 年 9 月起，中国开始陆续发表“九评”，中苏意识形态分歧陷入激烈的论战阶段。1964 年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共觉得这或许是中苏两党和解的机会。不过中共与苏共新领导都不打算做出原则性让步，也使得意识形态分歧难以调和，中苏和解的机会也就不复存在。^④ 1964 年后，美国对中苏分歧的认识更加客观，认为中苏和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并且预测由于中苏利益冲突的增加，双方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提升。^⑤

回顾这一期间中苏同盟的历程，意识形态分歧对中苏同盟形成了较大

① NIE100 - 3 - 60, Sino-Soviet Relations 9 August 1960,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ed., Tracking the Dragon: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on China During the Era of Mao, 1948 - 1976, NIC 2004 - 05, October 2004.

② CIA, NIE13 - 63, May 1, 1963, in "Tracking the Dragon," p. 276.

③ 胡晓丽：《美国的“楔子战略”与中苏分裂》，第 81 页。

④ 李丹慧：《失去的机遇？——赫鲁晓夫下台中苏两党和解的新尝试》，《社会科学战线》2009 年第 8 期，第 21 页。

⑤ 中情局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景的评估（1964 年 6 月 10 日），NIE 10 - 2 - 64, USDOS FOIA Website.

的负面影响。对于意识形态与联盟关系，以往的研究注意到了意识形态对于联盟形成和维持的影响。^① 不过对于意识形态与联盟分裂之间的关系，则很难从意识形态或国家利益的单一因素进行分析，而是必须考虑到意识形态分歧对盟国间的国家利益认知和战略选择的影响。周建仁的研究认为，“弱国自助能力和战略分歧在对同盟解体发挥影响上是互为条件的，在弱国自助能力强的情况下，战略分歧对同盟解体有影响，战略分歧越大，同盟越可能解体；而在自助能力弱的情况下，战略分歧对同盟解体无影响。”^② 对于中苏同盟而言，1956—1964 年，中国的自助能力有所增强，但相对于强大的对手美国而言，中国依然需要苏联的支持，但因为意识形态分歧导致中苏对国际事务、对美政策出现战略分歧并日益加大。在战略分歧增大和自助能力并未大幅提升的情况下，中苏同盟却逐渐走向破裂，这就说明战略分歧对于中苏同盟分裂的重要影响。对于这一阶段美国分化中苏同盟的楔子战略作用机制而言，通过对中苏的区别对待，美国促使中苏战略分歧加剧，而在中国自助能力有所提升的情况下，中国对苏联的忍耐度有所下降，导致中苏同盟内部矛盾加剧，同盟分裂加速。对于中苏同盟的战略分歧而言，意识形态因素发挥着极为独特的作用，意识形态之争是原则、路线之争，属于零和博弈，难以调和。^③ 关键地是，中苏意识形态之争并非纯粹的思想之争，纸上谈兵，而是涉及两国对国际事务和美国的认知与应对，并且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佐证，进而形成螺旋式激化状态。因而意识形态对中苏同盟的影响主要是表象，更为深刻的是战略分歧和利益分化。中苏的意识形态分歧影响到它们对于主要对手美国的认知，从而出现战略分歧，而美国适时地调整了其分化中苏同盟的楔子战略，进一步加剧了中苏同盟在战争与和平等“三和”问题上的战略分歧，

① 梁军：《联盟的建立与维持：历史经验视角下的理论建构与思考》，《社会主义研究》2015 年第 1 期，第 149 页。

② 周建仁：《战略分歧、自助能力与同盟解体》，第 67 页。

③ 沈志华：《中苏同盟破裂的直接表现与内在逻辑——对中央情报局“国家情报评估(NIE)”的评估》，第 15 页。

进而加剧了同盟的分裂，其中在中国发展核武器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有研究表明：“军事是联盟最为敏感的领域。盟国对军事援助义务的履行与联盟成员的军事地位取决于某些条件，军事合作中联盟成员国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和风险。”^① 中苏同盟在敏感的军事领域的合作既是联盟关系良好的表现，也是加剧联盟内部矛盾和分裂的重要因素。美国采取以压促变的楔子战略分化中苏同盟，多次对华实施核威慑，刺激中国增强了拥核意愿并加速了核武器研发进程。不过中苏在“三和”问题上的意识形态分歧，导致中苏对于中国发展核武器产生巨大分歧。中苏对核武器的不同看法导致中苏同盟在核援助方面矛盾不断，美苏缓和更是凸显了中苏核矛盾，美苏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加剧了中苏同盟的矛盾。这也部分印证了“高度机制化的军事合作却并不一定会带来更高的联盟可靠性。非对称型联盟的军事合作程度越高，反而会使联盟成员国越容易被攻击，也越容易被抛弃”。^② 围绕中国发展核武器，中美苏三角关系雏形初现，也使得美国后来对待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政策主要以分化中苏同盟为目标。

对于中苏同盟的分歧，美国的情报评估虽然较早注意到了中苏意识形态分歧，但对于其对同盟关系的影响并不确定。并且美国的情报评估还存在许多失误，这既与美国缺少在中国大陆的直接情报来源有关，也与美国情报界基于国家利益的逻辑分析中苏同盟有关，从而对中苏意识形态分歧的影响缺乏敏感性。^③ 此外，对于意识形态分歧和联盟分裂之间的过程需要一个推理和判断，也增加了情报分析的难度。^④ 尽管美国的情报评估存在失误，但对于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还是有所了解，针对中苏不同的对美政策，美国也开始采取了区别对待。美苏缓和、中美交恶加速了中苏分

① 梁军：《联盟的建立与维持：历史经验视角下的理论建构与思考》，第150页。

② 董作壮：《联盟类型、机制设置与联盟可靠性》，第110页。

③ 沈志华：《中苏同盟破裂的直接表现与内在逻辑——对中央情报局“国家情报评估（NIE）”的评估》，第11页；李丹慧：《20世纪60年代美中央情报局对中苏关系的评估——对美国情报委员会最新解密档案的分析》，《南开学报》2005年第3期，第14页。

④ 沈志华：《美国中央情报局眼中的中国——冷战时期美对华情报评估综合性文件概述》，第94页。

裂。美国在对华施压的同时,却与苏联进行缓和,通过拉打结合、区别对待,美苏缓和有利于加深中苏同盟的裂缝。美国认为,美苏缓和从心理方面可以分化中苏同盟。通过利用中国对“外国的西方人”之间可能以中国的牺牲作为筹码的交易的恐惧,华盛顿能够严重破坏北京对苏联的信心。^① 并且这种怀疑也并非毫无根据。比如赫鲁晓夫访美后对中国的劝说。在日内瓦会议期间,艾森豪威尔对朱可夫表示,他不认为苏联应该为中国人的行为负责,但美国的政策底线是:如果莫斯科希望与华盛顿缓和关系,就应该对中国做些什么。现实情况也印证了这些,苏联对发展西方关系的兴趣损害了中苏关系。苏联为了跟美国缓和,竭力表现温和的一面,这也导致莫斯科对中国的好斗姿态非常担忧。中国则告诫苏联,苏联人与美国关系的进展只能是以与中国的进一步疏远为代价。^② 随着中苏同盟的战略分歧加深,中美苏的三角关系已显雏形,在美国持续施压的情况下,美苏缓和必然引发中国的不满,中苏对国际问题的不同认识和对美政策分歧,也深刻地影响了联盟信任,使得中苏同盟矛盾增多,不断走向分裂。

六 结 语

本文主要分析了美国应对中苏同盟的楔子战略,其目的在于解释中苏同盟分裂的外部原因,这与以往大多从中苏两党两国的内部关系寻求同盟分裂原因有所不同。通过对其过程的追踪研究,发现美国的确针对中苏同盟实施了楔子战略,并且对于分化中苏同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联盟预阻阶段,主要采取相对有限的缓和政策,以防止中共完全倒向苏联。不过由于战略目标、战略资源和战略手段之间的失衡,美国阻止中苏结盟以失败告终。中苏同盟形成后,美国并未因此放弃分化中苏同盟的目标,而是调整了楔子策略,采用了“以压促变”的对抗性楔子战略,主要体现为

① 张少书:《朋友还是敌人?——1948—1972 的美国、中国和苏联》,第 154 页。

② 张少书:《朋友还是敌人?——1948—1972 的美国、中国和苏联》,第 196 页。

经济施压和原子威慑两条路径。不过美国分化中苏同盟的楔子战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中苏同盟没有意识形态分歧的情况下对中苏一视同仁地实施对抗型楔子战略，结果战略效果不佳。第二阶段中苏意识形态分歧开始出现，受此影响，中苏对国际事务和对美政策出现分歧，美国则采取了对中苏区别对待的楔子战略，结果美苏缓和、中苏交恶的情形深刻地恶化了中苏同盟。不过这并不能说明意识形态分歧对中苏同盟分裂的决定性作用。毕竟中苏意识形态分歧并非仅仅是思想之争，还与中苏的国际战略和对美政策分歧相互影响，与美国的政策和中苏对其的认知与回应密切相关。尽管美国分化中苏同盟的楔子战略在对华政策方面一贯高度施压，但对苏政策的微调却使得美国分化中苏同盟的总体楔子战略出现了由“一视同仁”到“区别对待”的调整，加剧了中苏同盟的战略分歧，也使得美国楔子战略的效果更加明显。

总体而言，美国分化中苏同盟的目标寄望于长期，战略目标相对较高。从战略阻力角度来看，中苏同盟是冷战时期美国最为强劲的对手之一，美国与中共之间的敌对也增加了美国的战略阻力。从战略资源来看，远东的地位不及西欧，而美国无法同时应对欧亚大陆两端的战略资源约束，也使其对华更多采用对抗性楔子战略。美国主要是采用中低强度的对抗性楔子策略来分化中苏同盟，尽管适时适当地采取一些奖赏性楔子策略更能促进其楔子战略目标实现，不过鉴于当时美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美国很难对华实施奖赏性楔子策略。从最后的战略效果来看，美国分化中苏同盟的楔子战略取得了一定效果，起到了加速中苏同盟分裂的作用。美国对中苏实施区别对待，导致中苏战略分歧加剧，随着中国自助能力的提升和美苏缓和的推进，中苏对彼此的包容度下降，同盟矛盾激化，加速了同盟破裂。不过从美国分化中苏同盟的对抗性楔子战略的实施历程特别是对华政策来看，美国事实上一直抱着消极的心态，让人怀疑其“不作为”，对于中苏同盟的分裂，美国到底是“不战而胜”还是“分而制胜”也存在争议。不过，通过对中苏同盟分裂的历程进行过程追踪，可以发现楔子战略对于中苏同盟分裂的影响不容忽视，分而制胜也确实加速了中苏同盟的分裂。